

韩晓宇, 曹 波, 王晓刚. 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影响[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8): 303–308.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8.079

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影响

韩晓宇¹, 曹 波², 王晓刚²

(1.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4; 2.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农户土地依赖性测定模型的构建, 利用陕西省多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 运用两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产生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产生较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中, 家庭总人口、非生产生活支出、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城镇就业意愿与城镇就业难度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 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非生产生活支出与城镇就业难度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的影响较显著的因素。因此可优化农户家庭内部要素, 构建顺畅外部渠道, 以促进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农户; 土地管理; 土地依赖性; 农地经营权; 退出与进入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8-0303-05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逐渐摆脱土地依赖的束缚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促使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与进入现象日益增多, 合理有序的农地经营权的退出与进入被认为是缓解农地撂荒和闲置问题、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土地适度集中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1-4]。同时, 对于增强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利益保障程度, 提升农业比较利益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实现农业机械化、科技化和现代化,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7]。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与社会高度重视农地经营权的退出与进入问题。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 2008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健全, 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与进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与进入进行较为广泛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驱动的影响因素^[8-11]; 二是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问

题、原因与对策^[12-14]; 三是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的效果^[15-18]; 四是国外或其他地区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的制度与借鉴^[19-22]。已有文献大多重点分析农地经营权退出影响因素或者将退出与进入视为整体进行分析, 将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影响因素进行区别对比分析的研究较少, 而基于农户土地依赖性角度对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进行影响分析的研究更鲜见报道。个别以农户分化视角进行的研究也多以单因素影响分析为主, 尚未见到综合考虑农户土地依赖性分化的研究。

在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进程中, 先后受到多重驱动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是追根溯源, 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与退出决策意愿与它对土地的依赖性紧密相关,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与退出的可能性, 而制度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则为其提供了可行性。因此, 综合考虑农户土地依赖性差异, 分析农民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与退出意愿产生的推力与拉力作用, 在当前农民与土地关系日益分化的时期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陕西省实地调研数据从农户土地依赖性差异的角度, 研究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影响, 进而得到合理引导农民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 促进农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政策启示。

1 理论基础分析

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生存依赖、保障功能依赖、心理依赖以及生活环境依赖等方面。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已经逐渐打破了我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依赖状态, 但是由于所处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差异, 导致农户在土地的依赖程度上出现了相应的分化, 从而影响农户对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选择。

1.1 情景分析: 初始假定

1.1.1 农地收益与依赖性分化 农地收益既包括通过种植

收稿日期: 2016-06-28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 2014D32); 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编号: 310823155030)。

作者简介: 韩晓宇(1975—), 女, 新疆哈密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及交通运输经济与管理研究。E-mail: fangweiliangaini@163.com。

经营土地获得的经营性收益,也包含在农地退出或进入过程中获得的财产性收益。农地相对收益越高,即农地收益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越高,说明农户获得非农收入的能力越弱,这类家庭须要极大地依赖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若农地收益比重低,说明农户非农收入比重高,这类家庭非农就业能力强,因此对土地依赖性大大降低。

1.1.2 农户资源禀赋与依赖性分化 农户资源禀赋包括 2 个方面:一是关于农地资源禀赋;二是关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农地资源禀赋主要包括农户农地经营面积、农地肥沃程度、地块区位、土地细碎化程度、机械化水平、交通条件等方面。农地资源禀赋直接影响农户农地生产效益情况,因此对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具有间接性影响。农户因家庭规模、劳动力构成、年龄分布、性别比例、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以及民族特征而对土地依赖性出现分化。目前,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家庭规模小的农户对土地依赖性较弱;非农劳动力比重大的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较小;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成员较多时,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弱;平均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对土地依赖性弱。

1.1.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依赖性分化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可以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人均非农就业收入高且稳定性好。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农户家庭倾向于在非农业生产领域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户的非农就业收入普遍较高,使得该地区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被削弱。

1.1.4 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与依赖性分化 土地对农民具有多重效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效用是基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甚健全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会保障功能。倘若农民有能力获得足够土地以外的社会保障,那么土地保障的必要性就会减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反之,若农民缺乏其他社会保障资源,只能主要依靠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则对土地的依赖性会被放大。

1.2 农户土地依赖性测定模型

为了满足计量分析中对变量选择的需求,本研究主要借鉴并改进韩晓宇等的研究思路^[21],测定农户土地依赖性的大小:

$$Y = (I_1/I_2)(L_1/L_2)(R_1/R_2)。(1)$$

式中: Y 为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 I_1 为农户年人均非农就业经营收入,元/人; I_2 为农户年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元/人; L_1 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总数,人; L_2 为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人; R_1 为农业经营风险; R_2 为非农就业经营风险。其中,农业经营风险(R_1)定义为农户放弃非农就业经营的机会成本(A ,元)与农业经营本身的风险(B)的总和;非农就业经营风险(R_2)可定义为农户放弃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C ,元)与非农就业经营活动本身的风险(D)的总和。即:

$$R_1/R_2 = (A+B)/(C+D)。(2)$$

式中:放弃非农经营的机会成本(A)可用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农地流转收入之和作计算。农业经营本身的风险(B)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本研究以全样本的平均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与样本家庭的平均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之差的绝对值与农户承包经营农地总面积的乘积作为农业经营本身的风险值。

放弃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C ,元)可用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作计算。非农活动自身的风险(D)指从事非农就业经营

存在的风险如失业风险等,在本研究中以全样本的人均非农就业经营收入与样本家庭的人均非农就业经营收入之差的绝对值与农户非农劳动力数的乘积作为非农就业活动自身的风险值。由于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中包含相应的土地保障部分,为了体现农户所参与的非农保障的多寡对其土地依赖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农户农业经营收入乘以农户参加保险种类占全部可参加保险种类的倒数处理方法加以强调。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确定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陕西省进行的抽样农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分 2 个阶段进行,涉及到陕西省 10 个地级市,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具体样本,共选取 49 个县(市、区)78 个乡镇)122 个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 000 余份,实际回收问卷 1 651 份,剔除异常样本后获得有效问卷 1 359 份。结果表明,在 1 359 户农户中有 19.65% 的农户(267 户)已经发生了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80.35% 的农户(1 092 户)没有发生任何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在发生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户中,只参与农地经营权退出的农户比例为 50.56% (135 户),只参与农地经营权进入的农户比例为 28.84% (77 户),同时退出与进入都参与的农户比例为 20.60% (55 户)。户主以男性为主(62.22%),年龄以中年居多(平均年龄为 41 岁),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的户主占比最大(40.16%)。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以 3~5 人为主(68.73%),劳动力数量以 2 人及以下居多(63.81%)。农户家庭年总收入居于 2 万~10 万元之间占比最大(38.57%)。绝大部分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78.57%),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较多(47.62%),参加其他险种的人数较少。

由于实地调查过程中只对未发生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的农户进行流转意愿的调查,因此只针对 1 092 户没有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样本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其中,有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农户共 366 户,占全部的 33.52%,没有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农户共 497 户,占全部的 45.51%,目前尚不明确的共 229 户,占全部的 20.97%;有经营权进入意愿的农户共 400 户,占全部的 36.63%,没有经营权进入意愿的农户共 445 户,占全部的 40.75%,目前尚不明确的有 247 户,占全部的 22.62%。农户没有参与农地经营权退出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只有务农的能力而无法胜任非农就业、劳动力充足可以顺利完成现有农地的耕作 2 个方面;农户没有参与农地经营权进入的主要原因为农地单位经营效益过低,无法通过增加经营面积而大幅度提高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缺乏、承包土地风险太大导致不敢承包等。

2.2 变量确定

2.2.1 因变量 本研究既考察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又要考察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意愿即农户对拥有或放弃农地经营权的主观愿望,无论是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还是进入意愿,均包括有(退出或进入)意愿、无(退出或进入)意愿与尚无明确意愿 3 种状态,本研究重点考察有无(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农户情况,主要对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与进入意愿进行对比分析。

2.2.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是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影响,因此农户土地依赖性是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依据前文分析可知,农户土地依赖性涉及到的影响因素众多,本研究主要选取农业经营与非农就业的经营收入、劳动力分化与风险水平的对比值对农户土地依赖性进行测估。利用农户土地依赖性的差异,可以将农户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农户的土地依赖性程度以数值 1 为界点,当估测结果大于 1 时,农户具有较弱的土地依赖性;当估测结果小于或等于 1 时,农户具有较强的土地依赖性。依据农户土地依赖程度在[0,0.5]、(0.5,1]、(1,10]、(10,+∞)的 4 个区间,可将农户划分为依赖性很强、较强、较弱与很弱的 4 个群体。

2.2.3 控制变量 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户的土地依赖性指标是多因子的复合型指标,因此控制变量的选择应该避免农户土地依赖性估测时已经涉及到的各个因素。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因素众多,大致可以划分为家庭内部因素、环境外部因素 2 类。从家庭内部角度来看,农户进行农

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通常以户为单位进行,以征得农户家庭所有成员的同意为前提条件。但在我国农村社会的特定氛围下,户主在家庭生活中一般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起决定性作用^[23]。其中,户主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会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意愿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首先选取农户户主的个体特征因素为第 1 组控制变量。农户资源禀赋中无论是农地资源禀赋还是家庭资源禀赋均会对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选择农户人均农地面积、家庭总人口与家庭非生产生活支出作为第 2 组控制变量。在农户所处的环境外部驱动因素中,无论宏观政策环境还是所在地政府的具体支持都会有效推动退出或进入意愿的产生,这里选取农地承包经营权年限的影响、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的影响与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作为第 3 组控制变量。此外,农户成员对自身城镇适应能力的主观判断会对退出或进入意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因此选取城镇就业意愿与城镇就业难度作为第 4 组控制变量(表 1)。

表 1 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种类	变量名称	变量代号	变量解释
自变量	土地依赖程度	土地依赖性	X_1	1,很强(0~0.5);2,较强(0.5~1);3,较弱(1~10);4,很弱(10~+∞)
控制变量	户主个体因素	年龄	X_2	户主年龄(岁)
		性别	X_3	1,男;2,女
		教育程度	X_4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4,大专以上
		农户资源禀赋	X_5	家庭承包农地总面积/家庭总人口数
	政策影响因素	家庭总人口	X_6	家庭总人口总数
		非生产生活支出	X_7	家庭年非生产生活支出(养老+医疗)
		农地承包经营权年限对农地退出/进入的影响	X_8	1,促进;2,没有影响;3,说不清楚;4,阻碍
		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地退出/进入的影响	X_9	1,促进;2,没有影响;3,说不清楚;4,阻碍
		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	X_{10}	1,没有支持;2,支持
	城镇适应特征	城镇就业意愿	X_{11}	1,不愿意;2,说不清楚;3,愿意
		城镇就业难度	X_{12}	1,没有困难;2,有一些困难;3,很困难
因变量	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	退出意愿	Y_1	1,有退出意愿;0,没有退出意愿
		进入意愿	Y_2	1,有进入意愿;0,没有进入意愿

2.3 模型选定

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上述各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与进入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有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可以视为分类反应变量的 2 个类别,因此本研究适合选择两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具体形式为:

$$\ln \frac{P_i}{1-P_i} = \alpha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cdots + \beta_n X_{ni}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中: P_i 为农户 i 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概率; n 为自变量个数; X_i 为自变量; β_n 为待估的影响因素系数; α 为截距项; ε_i 为残差项。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土地依赖性和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

3.1.1 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变量(X_1)在 0.01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的土地依赖性越弱,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弱,说明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比重比较高,非农就业的劳动力较多,家庭整体非农就业能力很强,而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因此农户更愿意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投向经济效益好、风险小的非农行业,导致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增强。

3.1.2 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 在户主个体因素变量中,在较低的置信水平上年龄(X_2)与教育程度(X_4)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性别(X_3)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表 2),即户主越年轻,越倾向于退出农地经营权;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退出农地经营权的意愿越弱;户主为女性的农户退出农地经营权的意愿更强烈。年轻的户主通常更向往城镇生活、便

利高效的工作,同时自身也具备较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因此渴望能够脱离土地的束缚。关于户主教育水平高却倾向于保留农地经营权的分析结果,合理的解释是,教育程度高不仅说明户主的非农就业能力强,同时也说明户主更容易具备较强的现代农业经营能力,在城市非农领域就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很多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选择回乡经营现代化的种养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也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女性户主更倾向于退出农地经营权,可能的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农业生产能力更弱,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承受力也会较差,因此更愿意退出农地经营权。

表 2 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模型估测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瓦尔德值	P 值	优势比
X_1	0.069 ***	0.025	7.975	0.005	0.933
X_2	-0.001	0.010	0.004	0.949	0.999
X_3	0.219	0.208	1.113	0.291	1.245
X_4	-0.030	0.122	0.059	0.809	0.971
X_5	0.012	0.030	0.168	0.682	1.012
X_6	0.154 **	0.076	4.139	0.042	1.167
X_7	0.000 ***	0.000	15.333	0.000	1.000
X_8	0.025	0.091	0.072	0.788	1.025
X_9	-0.084	0.084	0.997	0.318	0.919
X_{10}	0.412 **	0.191	4.675	0.031	1.510
X_{11}	0.287 **	0.134	4.592	0.032	0.750
X_{12}	-0.363 **	0.178	4.185	0.041	0.695
常量	2.404	1.015	5.612	0.018	11.067

注: *、**、*** 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表 3 同。

在农户资源禀赋变量中,家庭总人口(X_6)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生产生活支出(X_7) 在 0.01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极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拥有的总人口越多,家庭非生产生活支出越高,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越强。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农户家庭规模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中老人或孩子的比例较高,即高产出劳动力相对较少,因此农户家庭更愿意选择退出农地经营权,释放农业劳动力进入收益比较高的非农就业领域。家庭非生产生活支出高,说明农户在保证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之外,有能力支付较高额度的医疗和养老费用,那么对土地的保障功能的需求度就会降低,更愿意退出农地经营权。

在政策影响因素变量中,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X_{10}) 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获得的来自政府的相关支持与帮助越多,则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越高。在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形成过程中,农户对自身条件的综合评估产生的主观意愿是起点,而顺畅的支持帮助机制则是推手,有效推动着主观退出意愿向实际退出行为的过渡。

城镇适应特征变量中,城镇就业意愿(X_{11}) 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就业难度(X_{12}) 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城镇就业意愿越强,则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越强,城镇就业难度越大,农户倾向于压抑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希望在城镇就业的农户往往对农地经营的价值预期比较低,因此更希望可以退出农

地经营权。城镇就业难度大的农户,没有能力进入非农行业就业,只能选择农业生产保障生活需要,因此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大大地被弱化。

3.2 农户土地依赖性和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影响

3.2.1 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变量(X_1) 在 0.01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有极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土地依赖性越强,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地经营权的进入。土地依赖性强的农户家庭,通常缺乏具备非农就业技能的劳动力,或是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生活与社会保障均维系在农地产出上,在同等农地投入水平下,拥有较多数量的经营农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因此,此类家庭获得农地经营权的意愿就比强烈。

表 3 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模型估测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瓦尔德值	P 值	优势比
X_1	-0.080 ***	0.025	9.782	0.002	0.923
X_2	0.000	0.010	0.000	0.985	1.000
X_3	-0.223	0.226	0.976	0.323	1.250
X_4	-0.280 **	0.132	4.465	0.035	0.756
X_5	0.052	0.038	1.874	0.171	1.053
X_6	0.207 **	0.084	6.017	0.014	1.229
X_7	-0.000 ***	0.000	15.051	0.000	1.000
X_8	0.099	0.100	0.971	0.324	1.104
X_9	-0.030	0.093	0.105	0.746	0.970
X_{10}	0.003	0.214	0.000	0.989	1.003
X_{11}	-0.230	0.145	2.525	0.112	0.795
X_{12}	0.471 **	0.196	5.784	0.016	0.624
常量	3.308	1.118	8.746	0.003	27.317

3.2.2 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影响

在户主个体因素变量中,教育程度(X_4) 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在较低的置信水平上年龄(X_2) 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性别(X_3) 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即户主受教育程度越低,越愿意拥有更多农地经营权,户主岁数越大,尤其是男性户主,拥有农地经营权的意愿越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低,岁数越大,相对来说非农就业能力越弱,因此不得不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从而导致较高的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男性户主通常具有更强的农业劳动能力与更持续的劳动时间,因此有能力经营更多的农地。

在农户资源禀赋变量中,家庭总人口(X_6) 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生产生活支出(X_7) 在 0.01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极显著负向影响,即家庭拥有的总人口越多,家庭非生产生活支出越少,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越强。一般来说,家庭总人口数越大,拥有的劳动力也就越多,农户家庭有能力经营更多的农地,因此具有较强的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据调查,家庭非生产生活支出比较少的农户,通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非农收入投入到医疗与养老方面,那么只能依赖农地所能提供的保障功能,因此须要经营更多的农地以增加收入,获得相应的保障。

在政策影响因素变量中,在较低的显著性水平上,农地承

包经营权年限对农地退出/进入的影响(X_8)与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X_{10})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正向影响,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地退出/进入的影响(X_9)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负向影响,即农户认为当前的农地承包经营年限对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具有阻碍作用,因而抑制了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而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帮助会促进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产生,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的积极效应则具有激发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作用。现有农地承包期为 30 年,已经惹争议多年,不利于农地经营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稳定现有承包关系是农地产权改革的重要方向。政府的相关支持越多,越有利于推动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产生。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有效促进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的产生。

城镇适应特征变量中,城镇就业难度(X_{12})在 0.05 水平上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城镇就业难度越大,农户则会产生较强的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可以无障碍地在城镇就业的农户家庭多呈现兼业化分工状态,主要劳动力投入到利益比较高的非农行业,因此并不期望拥有更多的农地;而城镇就业难度大的农户主要的生活来源维系在农地产出上,所以增加农地经营面积是提高收入的重要方式。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农户土地依赖性测定模型的构建,利用陕西省多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两分类 Logistic 模型分析农户土地依赖性对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的土地依赖性越弱,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产生较为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土地依赖性越强,农户的农地经营权进入意愿也越强。在控制变量中,家庭总人口、非生产生活支出、是否得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村小组支持帮助、城镇就业意愿等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正相关因素;城镇就业难度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负相关因素;家庭总人口与城镇就业难度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正相关因素;教育程度与非生产生活支出是对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进入意愿有显著影响的负相关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户资源禀赋与户主个体特点,但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行为的因素主要为农户资源禀赋与政策制度因素两大方面^[24]。即在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形成阶段,政策因素产生的影响较小,起主导作用的是农户家庭内部相关因素,然后通过政策、扶持等外部推动巩固渠道,最初的意愿才有可能顺利转化成实际的农地退出或进入行为。因此,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第一,促进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推进农地规模化经营,首先须要重视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培育。虽然各级政府鼓励支持农地经营权的适度集中,但是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具有差异,不能盲目一刀切强制推行农地经营权的退出或进入,应该从农民的主体角度出发,充分尊

重农户的最初意愿选择。意愿培育的主要途径是对农户家庭内部特征的优化,因此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技术的培训力度、拓宽农民非农就业领域、增加农民的职业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应该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培训、提高农民现代化农业经营能力,为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夯实基础。第二,构建完善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的外部推动机制。外部推动机制包括稳定的政策、成熟的市场、合理的价格、资金与法律援助等,应该因时因地进行适度引导,巩固农户已经形成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或进入意愿,推进农地经营权向实际的退出或进入行为成功转化。

参考文献:

- [1] Deininger K. Land markets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form[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85(5): 1217 - 1222.
- [2] 张文秀, 李冬梅, 邢殊媛, 等.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1): 14 - 17.
- [3] 卞琦娟, 周曙东, 易小燕, 等. 农户农地流转现状、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资源科学, 2011, 33(2): 308 - 314.
- [4] 张英, 李秀彬, 宋伟, 等. 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52 - 560.
- [5]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 - 65.
- [6] 詹和平, 张林秀.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 142 户农户的实证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9, 18(7): 658 - 663.
- [7] 洪名勇, 钱龙. 声誉机制、契约选择与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研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6(1): 34 - 43.
- [8] 叶剑平, 蒋妍, 丰雷.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 2005 年 17 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4): 48 - 55.
- [9] 曹建华, 王红英, 黄小梅. 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转效率的评价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07, 21(5): 54 - 60.
- [10] 乐章.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解释——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2): 64 - 70.
- [11] 秦光远, 谭淑豪. 农户风险认知对其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4): 61 - 67.
- [12]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 理论与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 35 - 45.
- [13] 黄祖辉, 王朋. 农村土地流转: 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38(2): 38 - 47.
- [14] 韩松.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J]. 中国法学, 2012(1): 19 - 32.
- [15] Li G, Rozelle S, Brandt L. Tenure, land rights and farm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19(1): 63 - 71.
- [16] 俞海, 黄季焜, Rozelle S, 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J]. 经济研究, 2003(9): 82 - 91.
- [17] 刘莉君, 岳意定, 谭舒允. 基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王寻寻, 苗 齐. 不同补偿方式下失地农民福利状况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8): 308–312.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8.080

不同补偿方式下失地农民福利状况研究 ——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王寻寻, 苗 齐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利用森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框架, 采用模糊评价法, 研究了江苏省淮安市近郊农村接受不同补偿方式的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状况。结果显示, 失地后农民福利水平有所上升, 其中接受土地换保障补偿方式的农民福利优于土地换货币的农民, 但是总体上失地农民群体的福利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除去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福利有所恶化外, 其居住环境、生活保障、社会机会以及城市适应等方面的福利得到改善。继续完善当前征地信息公示, 促进征地操作流程透明正规化,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失地农民补偿标准, 并提高农民在征地中的自主权是当前政策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失地农民; 补偿模式; 可行能力; 福利评价

中图分类号: F320;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8-0308-05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地非农化配置的现象越演越烈, 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失地农民。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2030 年我国的失地农民数量将达到 1.1 亿左右^[1]。城市化一方面使农村土地、人口等资源趋于集中, 有序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以及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等原因, 农民失去的不只是土地本身, 还包括伴随着土地的一系列生产、生活等权益。强制性的征地以及不合理的补偿措施, 往往会导致农民失地后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如今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 实际上是对土地于农民而言所具有的保障功能的替代, 制定公平有效的安置补偿政策, 保证农民福利水平在失地前后的基本一致性应是安置补偿的最低要求。

为了采取合理的安置补偿方式, 完善现行补偿方式的不足, 需要调查农民失地后多方面福利状况的变化, 以其福利变

化的特点及影响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因素为依据。当前已有很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社会保障、收入变化等方面进行研究, 认为契合农民实际状况进行补偿, 才能让失地农民福利状况得到切实保障, 更好地实现新型城市化的目标^[2-4]。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模型分析的方式, 对江苏省淮安市近郊不同安置补偿方式的失地农民展开研究, 据此了解其失地后福利变化情况以及影响其福利满意度的因素, 探讨失地农民补偿方式的完善措施。

1 文献综述

目前, 关于失地农民安置补偿方式以及福利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结合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 对当前主要的几种安置补偿机制进行说明; 二是对当前征地补偿模式存在问题的研究探讨; 三是基于福利理论, 研究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情况。以前的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 集中在失地农民补偿模式及存在问题上, 近几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 两者相结合来评述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状况及城市适应性等方面。

1.1 补偿模式

依据学者们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模式的研究, 当前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 货币补偿模式和非

版), 2010, 13(6): 104–107.

[18] 姜 松, 王 钊, 曹峥林. 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经济效应及位序——来自重庆市的经验证据[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 27(8): 10–18.

[19] 吕 晔, 白 莹. 简论英国圈地运动对我国当前土地流转的启示[J]. 农村经济, 2004(1): 95–97.

[20] 范怀超. 国外土地流转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10, 30(3): 484–488.

[21] 高 强, 孔祥智. 国外及中国台湾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与服务

经验借鉴[J]. 世界农业, 2014(1): 172–176.

[22] 韩晓宇, 王 芳. 农户土地依赖性的测度及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关联性分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72–78.

[23] 周逸先, 崔玉平. 农村家庭户主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影响的调查与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3): 109–113.

[24] 韩晓宇, 王 芳.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1(3): 116–124.